

逯钦立先生的陶学贡献

吴 云

我曾参与编写一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史，此书为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丛书》十卷本中之一卷。任务确定后，我先看材料，并把有关陶渊明的资料，论文、专著，凡能找到的都读过了。令我惊喜的是，从1977年至1996年的二十年间，在研陶领域出版了大量的优秀著作和论文。冷静下来考察，发现近百年来在研陶领域中，集考证、校勘、注释和评论四方面之成就最大者，仍首推逯钦立先生。

逯钦立先生于1939年考入抗战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。1940年开始从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的搜集、整理、校勘工作，于1964年完成，全书135卷，250万字。其中便包括陶渊明的全部诗作。逯先生从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之日起，便注意并热爱陶渊明的诗歌。在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这一浩大工程告一段落后，逯先生又用近十年时间，专门从事校注《陶渊明集》，此书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如果说逯先生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用时二十四年的话，那么他的《陶渊明集》用时三十三年。此二书费时之久，用力之勤，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所罕见。

一部书的贡献大小，主要看此书是否在该学术领域形成台阶。我理解所谓学术上的台阶，应具备两层涵义：一是所完成的学术成果，同前人的同题成果比，更为完备、更加科学；二是此后人们再研究同题项目，必须参考该项著作，即必须踏着该项著作的台阶往上攀登。按此标准，让我们来考察逯先生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（内包括陶渊明的全部诗歌集），它的出版，使明代冯维纳的《古诗纪》和近代丁福葆所编的《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》，均大为逊色，故而逯先生的书形成了较高的台阶。不

仅当代人研究这段作品要用它，即便若干年代有人要想超过这部巨著，也必须踏着它的成就才能前进。至于《陶渊明集》更具备了学术台阶的条件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该书是我们所见到的校注本《陶渊明集》中之最佳者，它的校勘、注释之精确，至今仍为权威版本。作为学术著作，从1979年出版，到1982年便印了十万一千册，可见它影响之广。有人苛责《陶渊明集》后所附的《关于陶渊明》中的某些“左”的观点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曾在《试评三十年来出版的三本〈陶渊明集〉》一文中有过较详的说明，此处不再赘述。

逯钦立研究陶渊明，始于40年代初。1944年逯先生发表了《〈述酒〉诗题注释疑》。1946年6月又发表了《〈形影神〉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》。此文经过逯先生多方面论证，其结论是与倡导佛教的著名学者慧远主张相反，“实此反佛论之代表作品”^①。即是说陶渊明的《形影神》诗的思想内容，为反对当时风行一时的佛教思想的。这一结论，乃是千余年来陶学研究史上重大成就。逯钦立解放前的陶学论文为陶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，此后研陶者多参考此书。

逯钦立整理的《陶渊明集》由三部分组成：一为陶渊明诗文的校勘与注释；二为“附录”——关于陶渊明；三为“附录二”《陶渊明诗文系年》。^②逯钦立整理《陶渊明集》的功绩，首先体现在校勘方面。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流传到现在的旧集中，以《陶集》流传最广，版本也最多；而且各种版本的差异，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。为此，南宋的《蔡宽夫诗话》中说：“《渊明集》世既多本，校之不胜其异，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，不可概举。”（转引自《陶渊明集·出版说明》）因而导致历代注家和研究者意见分歧，莫衷一是。在此种情况下，当务之急便是

收稿日期：2010-03

作者简介：吴云（1930—），辽宁省义县人。天津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。研究方向：汉魏六朝文学、古籍整理。

^①逯钦立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46页。

^②逯钦立《陶渊明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。

对《陶集》进行精确的校勘，使研究者和读者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版本。逯先生知难而进，他以元初李公焕的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十卷本为底本，以曾集诗文两册本、焦竑藏八卷本、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等为校本，经过细心校勘，终于完成了这部《陶渊明集》。逯校《陶集》的最大功绩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备而准确的《陶渊明集》；它超过了宋、元以来大量的陶集版本，为进一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，提供了最可靠的诗、文全集。

逯钦立的《陶渊明集》的功绩，还表现在注释准确，要言不烦。例如《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》一书中，对“负痾”的注释，仅用“抱病”注文。又例如《形影神》一诗中的“凄漚”，凄，怆。漚，流泪貌。有些诗需注全句时，逯氏也是用最精练的语言来说明。

逯钦立的《陶渊明集》的功绩，也表现在书后所附的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》之中。例如：太元十八年癸巳（393），陶渊明29岁，初仕，“起为州祭酒。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”^①。为了论述上述系年，逯先生不仅引用《饮酒诗》，还引用《宋书·百官制》加以说明。逯先生的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》，对陶渊明的生平事迹、诗文主旨、系年等诸方面，多有创见，它乃是《陶渊明集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逯钦立的《读陶管见》^②写于1964年。在此长文中逯钦立谈了十二个问题。此文可称为逯钦立对渊明为人、思想、创作的基本看法。由于该文写于1958年至1960年第二次陶渊明大讨论之后，从内容考察可看出它回答了那次讨论中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，或对讨论中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在《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》一节中，逯钦立认为“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，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，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。”“陶渊明开始农耕和接近农民”一节，意在说明正因为渊明受农民思想影响，“他才最后决定不再走以禄代耕的仕宦道路，而要走以劳动谋取衣食的农耕道路”。关于“仕于桓玄、刘裕问题”一节，意在阐明“陶渊明的出任祭酒，主要是‘以禄代耕’思想决定的，是为贫而出仕，为奉侍老母而出仕的，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”。关于《陶渊明诗文的再审定》一节，逯钦立主

要考证出北齐阳休之所编的十卷本《陶渊明集》增加了“五孝传”和“四八目”，所增的全是赝品。关于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诗与卢、刘战争问题一节，逯钦立是有针对性而写的。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卢循乃是孙恩农民革命的继承者，从而责备渊明诗文中未能反映出卢循领导农民起义的历史。逯钦立用大量史料经过考证之后，指出：“不能简单地根据他（卢循）曾经是孙恩的部将这一点，就笼统地肯定他是站在农民方面发动这次战争的。对卢（循）、刘（裕）两个地主军阀这样的互相火并断送了很多兵士，也断送了他何无忌本人，陶渊明认为这是异患，自幸自己没有遭到这种异患，也就可以了，我们不应该更高地要求古人！”逯钦立对卢循的具体分析，从而提出不能过高地要求陶渊明。在前两次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中，尚未发现有谁能像逯钦立如此论述精辟，令人信服的。关于《陶渊明写贫困生活》一节也是有针对性而写的。解放初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，有些人认为他乃是封建社会的地主，他再穷也比农民强得多，从而否定陶渊明述说贫困的诗篇。为此，逯钦立以《杂诗》八首之八“代耕本非望”等诗篇为例说：“这些充满血泪的诗，不仅是陶渊明生活的写真，也表现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感情，诗人回到农村中去，经过长期耕种实践，当然更加熟悉和体会农民的生活愿望和理想，感染到农民的道德品质，因而他一定程度的同农民共呼吸同命运。”关于“陶诗的艺术性”，逯钦立用了近5千字的篇幅加以肯定。逯钦立在这一节中，重点说了三个问题：第一，写实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；第二，拟人化手法；第三，自然风格与韵律美。逯钦立对陶诗的艺术性论述得极为深刻，由于篇幅所限，具体例证只能割爱了。值得提及的是，《读陶管见》一文写于1964年。年岁略大的一些人都知道，1962年有了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号召，而1964年又值“文革前夕”。其时写文章分析古代作家作品的人，几乎都大谈思想性，避开或少写艺术性，而逯钦立却在此时用将近五千字的篇幅，大谈陶诗的艺术性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他的“逆潮流”的精神，是令人敬佩的。

在唐前众作家中，逯钦立最喜欢陶渊明。他的科研用在陶渊明身上的时间也较多。20世纪对陶渊明著作的研究整理、校勘、考证、注释、评论等诸方面，均做出较大贡献的要首推逯钦立。

考察一个人的学术贡献，不仅看他在大陆学术界影响多大，还要看在大陆以外的台湾、香港、澳

①逯钦立《陶渊明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5月版，第265页。

②逯钦立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1月版。

门地区以及日本、美国等这些对汉学研究比较重视的国家有多大影响。台湾地区对逯先生的三部著作，都极为重视。日本和美国也如此。我曾托友人在日本进行过调查，日本的汉学研究家，对逯先生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和《陶渊明集》颇为看重。我的孩子吴伏生在美国东部布朗大学读博士学位时，专事比较文学研究。陶渊明在美国汉学界是热点之一，而且逯钦立的三部书在各学校图书馆均有收藏。他毕业后又到中西部犹他州的一个大学任教，发现中西部地区对逯先生书的收藏情况，与东部重视程度相同。为此，我才敢于提笔写此篇短文。

至于逯钦立先生何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心向学，苦读精研，写出这三部传世之作的问题，我也曾思考过，答案是除了他个人刻苦向学之外，与时代和环境有密切关系。他读研究生时正值抗日战争之际，环境是昆明西南联大。在这段时间，昆明这块宝地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。北京大学考古系阎

文儒教授曾多次向我提过“昆明郊外的宝台山曾有十个翰林”。所谓“十个翰林”，是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于1939年第一批招的研究生，并在“昆明北郊龙泉镇（俗称龙头村）外宝台山响应寺，距城二十余里”（见郑天挺《逯钦立〈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〉序》）学习过的十个人，按郑《序》依次为：任继愈、王明（哲学）、阎文儒（考古）、汪篈（历史）、杨志玖（历史）、逯钦立、阴法鲁（中文）、马学良、刘念和、周法高（语言）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，便是在抗日战争时的特殊历史时期内、特殊的环境里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而成才的。为此，我又想起了孟子的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”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于是我进而又想逯钦立先生多年从事学术研究，到晚年逝世，仅三十三年时光，倘若解放后少一些政治运动，特别是像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样运动，他要能活到今天，其传世之作会更多些吧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

（上接第27页）

之后，更有许多学者写文章作了高度的评价。也有学者继之作拾遗补缺的工作，都不能不提到逯先生开山辟路的功绩。逯先生生前甘于寂寞，身后却并不寂寞。今天有志献身于古籍整理事业的学者，更当放眼未来，爱护并传承传统文化，大可不必被眼前的评估体系所吓退。

从本书的问世，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历史阶段学术文化既有兴旺发展的条件，也有限制和干扰的因素。逯先生的力作，在1948年完稿时，因为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而未能及时出版，直到1959年才为人所

知，引起各界的重视，列入了出版的规划。而经过反复商讨，到了进行最后的加工定稿时，又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而中断，直到1983年才出书，可惜逯先生自己看不到了。今天幸逢稳定和谐的时代，我们应该珍惜这一机遇，努力学习逯先生的敬业精神，安神静气、细致耐心地做好中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繁荣、大发展。

（责任编辑：石磊）